

全球化前時代：重寫歷史與一個共同的過去

曼索*

在葡萄牙海外大發現正式開始五個世紀之後，在進行了十年的正式慶祝之後，現在要做的工作是來簡短地回顧一下這一切意味著甚麼？當時，無論是推動了這一活動的人民，還是那些經受了“殖民過程”的人民對此有那些感受和分析，同時對最主要的研究工作進行了那些評論。¹

一開始，王室當局便企圖讚揚海外發現的事業，尤其是將歷史為國家及豪門巨室服務（這是由當時剛剛設立的皇室總編年官，以及後來由印度的總編年官承擔的任務）。海外征服的歷史在他們的筆下有著重要的地位。根據馬爾克斯的看法，“敘述和解釋海外擴張的願望和需要使得出現了一種超越國界的史無前例的新史學。”²尤其是朱拉拉創造了一種新的歷史概念，因為從征服修達開始，地理範圍擴張了，改變了國家政策的方向，出現了海外發現的軌道，因此，有必要將新的地理區域和豐功偉績介紹給人民，同時讚揚貴族。

在這些編年史家之前和之後，有許多世俗和宗教的人士也敘述了海外發現這一壯舉。即便記錄了某些事情，他們批評了某些王室官員

* 葡萄牙埃武臘大學教授

1. 我們的論文並不想包括擴張和海外發現的全部過程，即世俗和地理發現的整個過程，然而由於篇幅的關係，加之迄今為止在這方面已經有了許多的論文，我們如果不引用它們的話，很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所以我們僅僅對官方的海外發現紀念活動做一簡短的回顧。我們認為，應該強調近期所發表的關於所謂東方帝國最主要研究論文，尤其是在那些研究成果不多的課題。我們之所以選擇東方，同時也是因為本年我們在巴依亞大學教授了葡萄牙在印度擴張史這一課程，同時我們也完成了巴西大學歷史教學計劃的編寫，而東方卻沒有被列入。
2. 馬爾克斯主編《葡萄牙史學史》，第1卷：從起源到埃爾庫拉諾，里斯本，歐美出版社，1974年，第25頁。在編寫有關這些豐功偉績的作家中，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朱拉拉、皮納、戈伊斯、卡斯達涅達、巴羅斯、科雷亞及科多等。

的做法，尤其是他們的受賄行為及在捍衛帝國，尤其是東方帝國方面的疏忽。例如科多的《身體力行的士兵》這本著作的目的幾乎總是讚美葡萄牙人在世界各地的歷史，尤其是世俗和精神征服的歷史。在精神征服方面，值得指出的是由傳教士和官員為我們留下的資訊。這兩種人士在殖民過程中起到過重要的作用。他們當時所提供的葡萄牙人在某些地區的政治和軍事消息是十分珍貴的，例如印度東海岸、遠東和莫臥兒王國。正是上述兩類人，在許多情況下，幫助商人定居或者僅僅作為一種外交代表，阻止歐洲其他的宗教及政治利益的定居。在此方面，我們應該著重指出的是耶穌會提供的資訊，它主要包含在從各個差會彙集而來的年度報告中。³這些年報不僅僅涉及宗教問題，同時也描述他們同已經立足的歐洲政治當局及同本地政治及宗教當局的關係。然而，這些報告的重點是弘揚歐洲文化，尤其是將基督教介紹為唯一能夠拯救人類的宗教。這一看法實際上一直延續到現在：“英雄”的形象和對基督教價值的讚揚，在很長時間內將繼續成為西方歷史的中心。新國家也利用歷史教育作為社會化的成分，未加以政治化，然而卻企圖向人們灌輸有爭議的價值和嚴格的自覺性。然而，在葡萄牙建立民主制度的最近30年內，開始對葡萄牙人的海外發現進行一種新的歷史探討，主要是15世紀到17世紀這一時期。⁴

從史學的角度來看，這一變化之所以在葡萄牙出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出現了多種碩士課程，尤其是海外發現歷史方面的碩士課程。還要歸功於其他一些專門從事這方面研究的科研機構。在此，應該特別強調的是葡萄牙海外發現紀念全國委員會。它不僅僅設立了研究獎學金，同時花大量的資金出版研究成果，尤其是出版了《汪洋》和《自由大海》這兩本雜誌。除了這一機構之外，還有高秉根基金會、東方基金會和其他研究中心，例如戈伊斯中心、海外研究中心⁵、葡萄牙東南亞

3. 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有許多從耶穌會不同差會發回來的手寫信件，同時在里斯本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有許多印刷版的信件，例如科雷羅《1604-1605年報》和《1606-1607年報》。里斯本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有15種這位神甫的作品。

4. 對葡萄牙海外發現解釋的重大轉變應歸功於戈蒂紐的《發現與世界經濟》，第2版，4卷，里斯本，存在出版社，1991年。

5. 這一中心從2002年開始便出版《海外歷史年刊》。

研究中心⁶和教育部紀念葡萄牙海外發現工作小組。他們為這些領域的科學研究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同時，我們還不應該忘記所舉辦的一系列學術研討會，例如國際大會、演講會及研討會。這些會議有世界各地歷史學家的參加。在此僅舉幾例：“東南亞與遠東國際研討會(1991年)”，“達伽馬及印度國際會議(1998年)”和“葡萄牙-巴西：回憶及形象葡萄牙巴西國際會議(1999年)”等。

我們現在來推翻那些阻止我們觀察“他人”的高牆。上述機構及學術會議是造成這種改變的最主要因素。它們為這些改變作出了主要工作。這一改變，一方面表現在重提“舊話題”，另一方面，展開了“新課題”，尤其是那些對於史學家們來說不太熟悉的地理區域的研究。如今，全球化已經成為了一種時髦的話題，或許我們可以回憶一下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進行的海外發現的航行在人類的歷史上所展開了的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它與不同的人民和不同的地理區域有了接觸，這樣便開始了全球化前時期。通過它，葡萄牙這樣一個國家，創造了一個廣闊的海上帝國。儘管在某些地方它的存在是曇花一現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葡萄牙的存在一直延續了5個多世紀，例如在果阿、澳門、帝汶、莫三比克和安哥拉。無論定居的方式如何，無論葡萄牙採用了那些殖民模式，葡萄牙人的出現帶來了文化、語言、宗教方面的變化，同時，也應該看到，葡萄牙語本身也接受了很多影響。毫無疑問，對葡萄牙社會的變化作出了貢獻。應該在文化交流的基礎上，對“新歷史”進行詮釋，拋棄以歐洲中心論的“這邊”舊看法和似是而非的“那邊”受害者的看法。

那些最著名的課題是在葡萄牙歷史上研究最多的題目。毫無疑問，首選的研究對象是達伽馬這個人物。幾年前，葡萄牙想起來要慶祝這位海軍上將抵達印度500周年，於是展開了一系列的活動，出版了研究著作，召開了國際會議。不幸的是，與人們的希望相反，並不是所有的慶祝活動都是一帆風順的，或對“嚴肅”地研究這位英雄作出了

6. 值得指出的是，這是葡萄牙唯一進行東南亞研究的中心。歐洲研究者對這個地區的研究不多。然而我們應該指出某些關於帝汶的研究，例如，馬托斯《葡屬帝汶 1515-1769：史論》，恩里克王子歷史學院，里斯本大學文學系，里斯本，1974年和貢內《帝汶 500 年》，東方文粹出版社，1999 年。

貢獻。如今，我們確切地知道他生於錫內斯，是埃斯特萬·達伽馬的合法兒子。1519年被封為維蒂格拉伯爵。另外一些研究給我們帶來了新的看法，幫助我們解釋他於1497年前往印度之前的生平，以及他返回以後的生活。這位海軍上將的生平中，明顯地還有不太為人所知的地方，尤其是因為沒有史料可以確實或推翻一些現成的說法，例如其父的逝世問題，何時、何地、如何逝世仍有待澄清，然而，這些研究使得我們瞭解了這位人物及其時代的情況。我們現在對他更加瞭解了，而且是更加具有科學準確性的瞭解。⁷我認為，這位人物已經不再是崇拜的偶像，而成為了一個那個時代僅僅執行了王室決定的人物。他在印度的表現如同任何一個他那種身份的人面對發現應該有的做法。也就是說，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主導著他同“他人”的關係的立場，一種優越感導致將西方文化強加於人。在此之中，也曾經進行過奴役活動，摧毀當地文化，尤其是通過強制性歸依強加歐洲文化。某些非歐洲歷史學家對他以當代倫理標準進行的評判，實際上也是一種“罪孽”，所犯的錯誤不亞於那些企圖將其偶像化的人，因為他們都未設身處地來評論這位人物。

不幸的是，巴西發現500周年慶祝活動也有同樣的立場。葡萄牙官方的慶祝舉辦了一系列學術研討會，出版了關於卡布拉爾⁸生平的著作，然而，另外一些人企圖將此航行降低到一種殖民主義的立場，將其視為對印地安人的屠殺和財富的掠奪。實際上，將這一豐功偉績降低為一種暴力的態度也並不能幫助來科學地詮釋巴西的葡萄牙殖民歷史。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去掉”西方態度（優越感）以及被殖民者的態度（卑下感）。他們將葡萄牙人的出現看作是日前社會所面臨的許多弊端的根源。

7. 伯崇《達伽馬》，法亞爾出版社，巴黎，1997年；馮賽加《達伽馬及其生平、航行及時代》，里斯本，世博會，1998年及阿連特茹協調委員會，1998年。曼索“歷史上的伽馬及伽馬家族”，《從葡萄牙西海岸·達伽馬及其時代國際會議論文集》，葡萄牙海外發現全國紀念委員會，1998年，第67-81頁。《達伽馬與印度》，巴黎，1998年5月11-13日，里斯本，高秉根基金會，1999年。

8. “葡萄牙——巴西：回憶及形象葡萄牙巴西國際會議”，1999年11月9-12日，高秉根基金會及教育部紀念葡萄牙海外發現工作小組，1999年。加爾西亞《韋拉克盧斯地·巴西發現500年》，里斯本，愛丁佛爾出版社，2000年。

我們已經說過，儘管對這一時代的豐功偉績有過不太科學的詮釋，然而的確情況是，我們已經有了許多研究可以使我們更加瞭解以前所不太瞭解的課題以及地理區域，甚至至今從未研究過的課題和地理地區。但是，在分析一些著作之前，我認為，它們改變了對葡萄牙人在世界上歷史的看法，同時也指出那些為專業歷史學家所未重視的區域。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托馬斯對評價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史學家戈蒂紐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前者認為後者指出了新的研究方法，補充了迄今為止的論述，尤其是將戈蒂紐的方法同他的著作《從修達到帝汶》進行了比較。我們援引他的評論：“戈蒂紐所做的研究的深層含義通常來講，是一種對大範圍地理經濟區域的研究，而且時間跨度很長。本書中所彙集的研究恰恰相反，時間短，所強調的是政治歷史，社會及經濟歷史次之及分析方向。這一主要傾向並不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選擇，也不是一種研究體系的選擇，而是基於對所採取的看法高瞻遠矚性的信念：很大程度上是隨意的或許是一種無意識的將與前代所不同的看法表達出來的潛在願望，然而，卻是同前一時代相吻合的。在戈蒂紐所做的總結之後，我們所研究的領域主要是短時間的分析。這還有工作的餘地。”⁹

的確，托馬斯講的這番話很有道理。在戈蒂紐所作的宏觀分析之後，我們還應該加上博克塞的一些著作，例如《葡萄牙海上帝國1415-1825》。在這本著作中，他論述了葡萄牙海上帝國從擴張初期到巴西獨立的過程，對已經研究很多的地區再次著墨，然而卻忽略了像孟加拉灣和東南亞這樣的地區。實際上，在這些地區有過很多私商、海盜和冒險家。他的著作基本上忽略了文化性質的問題，僅僅有幾頁來描述葡萄牙東方保教權的問題。¹⁰托馬斯研究較多的正是這些被遺忘的地

9. 托馬斯《從修達到帝汶》，里斯本，迪費爾出版社，1994年，第XI頁。

10. 博克塞《葡萄牙海上帝國1415-1825》，里斯本，70年代出版社，1992年。值得指出的是，博克塞是為葡萄牙海外發現的研究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名人之一。除了對政治及經濟史的特殊興趣之外，同時他撰寫的一些著作現在已經引起了葡萄牙史學的特殊注意，尤其是性別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可見《伊比利亞擴張中的婦女》，里斯本，地平線出版社，1977年。阿爾布爾克是另外一個葡萄牙史學的巨匠。他不僅僅是東方問題，同時還是大西洋問題的專家，其主要作品有《葡萄牙發現史上的疑問及定案》，2卷，里斯本，讀者圈，1991年，《葡萄牙發現歷史導論》，里斯本，歐美出版社，1983年，《葡萄牙發現史字典》（阿爾布爾克與多明克斯主編），2卷，里斯本，讀者圈，1994年及《葡萄牙在世界》（阿爾布爾克統籌），6卷，里斯本，阿爾法出版社。

區，尤其是現代史學幾乎遺忘的帝汶問題，同時這位歷史學家對經濟及政治社會問題予以了特別的注意，而將文化歷史置於一旁。這種情況在印度歷史學家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身上也有重複，其著作《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便是一個例子。¹¹然而，最近佛洛爾斯所發表的碩士論文《葡萄牙人與錫蘭海：貿易、外交及戰爭（1498-1543）》所涉及的這個領域是葡萄牙人在當地歷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然而迄今為止從未有人對其做過研究。¹²

約十年前，當我們考慮準備一部歷史博士論文時，我們選擇了耶穌會在印度的兩個省的題目（果阿和馬拉巴兒，1542-1622），因為當時我們看到文化史仍然是處女地，因為當時大家都一致認為這是一個基本的課題，是更好地瞭解政治史和經濟史背景性的領域。¹³的確，當時史學家的注意力不在於文化史，尤其是不注重宗教史。¹⁴我們認為，至其時為止所寫的歷史是由與教會有關的人士所撰寫的教會歷史，自然會帶有護教的立場。或者是由那些企圖指出教會在社會中負面影響的人所編寫的著作。因此，這類歷史實際上是一種價值觀的歷史，其目的是為了評判某些事實。

當時我們看到，要寫這個題目困難重重，不僅僅是因為已經出版了許多宗教性質的著作，同時還因為當時有許多史料。這些史料很有可能不會為我們提供一個對耶穌會的活動不同看法的新資料。這是從歐洲方面來看的實際情況，但是從“亞洲”方面來看，儘管對葡萄牙人的歷史，例如在印度的歷史有另外一種看法，但是歐洲社會給它所接

-
11. 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里斯本，迪費爾出版社，1993年及《貿易與衝突，葡萄牙人在孟加拉灣1550-1770》，里斯本，70年代出版社，1994年。
 12. 佛洛爾斯《葡萄牙人與錫蘭海：貿易、外交及戰爭（1498-1543）》，里斯本，宇宙出版社，1994年。
 13. 在此，我們想着重指出兩位研究葡萄牙當代文化史的專家，他們涉及了發現問題。一是迪亞斯的《唐若望三世時代的文化政策》，科英不拉大學哲學研究所，1969年和白烈度的《葡萄牙文藝復興時代的知識之路：歷史研究及文化理論》，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6年。
 14. 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出版的幾本著作開始注意文化史問題，例如，蘇札的《中世紀果阿·17世紀的城市及內地》，里斯本，印刷出版社，1994年和洛佩斯的《18世紀的果阿：傳統與現代性（1750-1800）》，里斯本，天主教大學葡語人民及文化研究中心，1996年。

觸的人民帶來的影響有時不會形成對歐洲在上述地區的一切活動的譴責。這兩類著作都忘記了瞭解這些事件的背景情況，例如里奧在涉及歷史時，這樣寫道：“……現在已經不是令人欣慰的學科，其目的僅僅在於使目前的狀況得到合法性或者來解釋進步、國家、民族，不外乎這些人或那些人對預言憧憬的懷念。”¹⁵

的確，從文化的角度，尤其是宗教角度來看歷史的話，只是在最近十年才引起了特別的注意。這表現在召開了的一些學術會議上。¹⁶有些個人的作品。有些關於印度的作品是與教會有關係的人編寫的。同時，也有一些不以宗教史為中心的作品，例如波爾基斯的《耶穌會的經濟問題1542-1759·興衰詮釋》（新德里，概念出版社，1994年）一書。這本書從經濟的角度分析了耶穌會。最近又有兩本新著問世，即拉克圖爾的《耶穌會》（2卷，里斯本，印刷——讀者圈出版，1993年）和阿爾登的《偉業的開創：耶穌會在葡萄牙·其帝國及延伸》（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6年）。¹⁷

拉克圖爾已經脫離了教會中心的範疇，然而其兩卷著作並未能深入地闡述他所提出的議題。這種情況在作者企圖為某些耶穌會傳教士做傳記時顯得特別明顯。他所寫的傳記脫離了相應的歷史背景。另一方面，作者特別關注的是法國耶穌會士，而不是作為一個教團的耶穌會。在其他方面，我們還可以指出，他沒有引用法國以外的出版物，尤其是葡萄牙和印度的著作。因此，許多與耶穌會在亞洲和美洲活動的方面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同世俗政權的關係及對當地文化適應的問題。

15.《一種統治，一種看法·文化史初編》，里奧與司禮內里主編，里斯本，印刷出版社，1998年，第34頁。

16. 所涉及的著作有：《耶穌會在印度：歷史角度的分析》，論文集主編蘇札與波爾基斯，澳門文化學會，1992年；《葡萄牙傳教及文化交融》，葡萄牙天主教大學，葡萄牙海外發現全國紀念委員會，1993年；《耶穌會及在東方的傳教》，葡萄牙天主教大學，1997年；以及《葡萄牙擴張中的婦女面孔》，婦女平等及權力委員會，1994年。

17. 值得指出的是，在葡萄牙和歐洲其他國家耶穌會繼續是研究的對象。我們可以列舉的著作有：樂羅阿《耶穌會神話》，里斯本，羅馬出版社，1999年。目前，佛郎哥正在準備題為《葡萄牙耶穌會神話（16-20世紀）》的論文，其研究將包括耶穌會在海外活動的情況。

阿爾登的著作比較了耶穌會在葡萄牙、果阿、馬拉巴兒、日本、中國、巴西及馬拉尼翁省或副省在1540-1750年之間活動的情況。由於這本書是從耶穌會的創始開始一直寫到其結束為止，所涉及的區域非常廣泛，作者無暇顧及某些研究不多的地區，例如印度的馬拉巴兒。¹⁸

同時，還出現了另外一種史學傾向。這種傾向在葡萄牙幾乎未得到注意。這便是對於性別的研究，至少是性別在葡萄牙擴張過程中的作用。整個擴張實際上是一部以男性為主的歷史。

至於性別問題，在我們結束此文之前，我們想涉及那些世俗與宗教的歐洲婦女或土著婦女。長期以來，她們被認為是葡萄牙帝國組建過程中不甚重要的成分，然而博克塞的(先驅性)著作《伊比利亞擴張中的婦女》及在“葡萄牙擴張中女性面孔會議”上發表的眾多論文所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最近，科特斯在其《流放者與孤女：葡萄牙帝國由王室所領導的殖民(1550-1750)》一書中，向我們涉及了婦女在由葡萄牙王室所開創的帝國殖民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¹⁹關於婦女，還有很多可研究，尤其是在葡萄牙。在葡萄牙，直到近期，性別問題才開始得到分析研究，但是能使我們對婦女在帝國活動中的活動有一個整體看法的總括性著作不多。²⁰然而，我們欲知道那些有勇氣背井離鄉——女

18. 後來我們對馬拉巴兒地區在我們的博士論文中進行了研究，請見《耶穌會在印度：1542-1622·其傳教及文化活動》，2卷，複印本，埃武蠟，1999年。

19. 科特斯《流放者與孤女：葡萄牙帝國由王室所領導的殖民(1550-1750)》，里斯本，葡萄牙海外發現全國紀念委員會，1998年。我們知道在果阿出版了一部著作，但不幸的是我們無法在歐洲各國的國家圖書館查閱到它。其作者是加爾西亞斯，題目為《果阿婦女面面觀》，新德里，概念出版社，1998年。同時還出版了一部關於東南亞的著作：《婦女、性別及現代早期東南亞史》，安達亞出版，2000年。

20. 我們已經寫過，這便是葡萄牙史學關於東方帝國的現實，也就是說，仍然有許多工作可作，然而，我們需要指出的是，《汪洋》雜誌第21號是題為“咸海中的婦女”的專輯，葡萄牙海外發現全國紀念委員會，1995年。至於巴西，我們知道情況有所不同，因為巴西有一批研究人員目前正在考察這些婦女如何幫助在巴西及非洲葡萄牙帝國建立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我們所能列舉的研究是，正在由伯南布哥天主教大學和聯邦大學所進行的一項計劃：《順從與幽禁：殖民時代伯南布哥的婦女收容所》。巴西利亞大學非洲巴西研究中心的協調員潘托雅也於2001年在莫桑比克研究了婦女問題。在她的協調下，出版了：《在非洲與巴西各地之間》，巴西利亞，平衡出版社和聖保羅，零點出版社，2001年。同時，那西門托《宗教權與宗教·巴依亞德斯特洛修道院中聖克拉拉會修女的隱居生活：1677-1890》，巴依亞，州文化委員會，1994年。

性宗教人士、妻子、母親、妓女、孤女、流放犯——定居海外的情況。她們可能再也沒有返回祖國。她們同土著婦女建立了甚麼樣的關係？總而言之，她們幫助在歐洲以外建立了一個甚麼樣的世界？我們想再一次強調，婦女及宗教史問題，在葡萄牙史學中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